

真实的刘文彩：兴办教育 接济贫困

一提到“地主”，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我们心目中“地主”的化身。不过，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

泥塑《收租院》与刘文彩无关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1965 年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小大小共 114 个，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

1999 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真实的刘文彩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

刘文彩为了家乡的教育，修建了学校——文彩中学。文彩中学占地 2000 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文彩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

学校建成后，刘文彩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愤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彩中学的教训中刘文彩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文彩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

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文

彩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拆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

塑造出来的黄世仁

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八路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据《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不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贺敬之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1945 年 4 月 28 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南霸天”死后 4 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游击

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据《海南视窗》报道，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 4 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是目前唯一健在熟悉张鸿猷的人。他说，张鸿猷是个善人，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寻找英雄》一书中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

《半夜鸡叫》子虚乌有

《半夜鸡叫》中的恶霸地主周扒皮，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

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 人民文摘》2012 年第 9 期文 / 余玮

美国曾流行“飞机马戏团”



两名表演者在飞行中的飞机机翼上打网球

上世纪 20 年代，美国有一种很流行的娱乐活动，那就是现今已鲜为人知的“飞机上的杂技表演”。这种“玩命特技”包括在高空从一架飞机跳向另一架飞机，站在机翼上跳舞或打网球等。表演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满足人们追求刺激和娱乐的需求，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谋生。

一战期间，美国制造了大量的“柯蒂斯 JN-4s”双翼飞机（通称“詹尼机”），几乎每名飞行员都学会了驾驶这种飞机。战争结束后，大批飞行员失业，而美国联邦政府又廉价出售剩余物资，其中就有“詹尼机”和外观类似“詹尼机”的“标准 J-1”双翼飞机，这促使许多退伍军人买下了他们自己操作的飞机。当时美国对空域尚未进行有效监管。于是，“空中特技”迅速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背景下，成为一名特技飞行员或高空杂技演员是颇有吸引力的谋生方式。他们通常单独工作或以非常小的团队形式演出，但也有一些大规模的“飞机马戏团”，这种“马戏团”由多架飞机和多名特技人员组成。大多数演出会在乡间小城镇上空进行。他们同所在地农民协商，使用他的一块田地作为临时跑道。之后，一名或一组飞行员会“低飞”越过村庄，投下介绍只需一小笔费用就能乘坐飞机的传单和“特技”广告。一般来说，人群会跟着飞机来到指定地点，买票和观看演出。在一些城镇，一名“巡

回演出者”或一支“空中部队”的露面会导致这个城镇的人放下所有事情，蜂拥前去观看表演。在普通民众眼中，“巡回演出者”进行的是一项冒险而浪漫的活动，他们也往往被视为英雄。

“巡回演出者”表演各种特技：包括旋转、俯冲、翻跟头和桶滚；“空中飞人”在机翼上行走，特技跳伞，从一架飞机跳到另一架飞机或地面上行驶的小汽车里，穿过火圈，坐在飞机顶部的桌子上进餐，甚至在机翼上打网球、摄影、跳舞等。

其实，特技表演者们的经历没有想象的那么浪漫。“巡回演出者”杰西·伍兹说：“这样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我睡在机翼底部，我要学会入睡时如何不掉下去。”表演者都需要很好的平衡力，就像格拉迪斯·罗伊和伊万·昂格罗那样，他们能在飞行中的飞机顶部打网球。罗伊 1927 年死于一场事故，她发动飞机引擎后，不幸被卷入螺旋桨，死时年仅 25 岁。

前一战飞行员奥莫尔·洛克利尔的绝招是用一只手臂挂住飞机，他经常通过这一方式修理飞行中的飞机。1920 年，他在一场电影拍摄中驾驶飞机，但不幸由于灯光照明导致双眼模糊，最终飞机坠毁身亡。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纳粹德国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在一战结束后也曾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玩命特技”表演。

此类“玩命特技”20 年代前期在北美达到顶峰，但到 1927 年，竞争压力的加剧迫使表演者们采用越来越多更危险的技术动作，随着表演事故的剧增，该行业的安全问题受到当局关注。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对航空表演施加诸多限制，颁布了多项法案，开始监管刚刚起步的民航领域。

1941 年冬，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卷入战争，随即实施更为严格的本土航空管制，私人飞行员的特技飞行已经无法持续下去。而且，在国家的召唤下，飞行员们都去参军，所以这种“巡回演出”也就完全消亡了。

《 环球时报》2013.1.6 文 / 葛元芳

为祸惨烈的《公安六条》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停止活动，长达十年没有开会，1954 年宪法和仅有的几部法律均被废弃，整个国家处于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但是，为了使“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合法化，在文革初期又出台了一个具有极大震慑力的文件——恶名昭著的《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的出台

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一个红头文件，题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由于它的内容只有六条，并且是专门针对公安工作发布，人们便将其简称为《公安六条》。

尽管这一《规定》只有六条，但都非常严厉，尤以第 2 条和第 4 条最为严厉。

第 2 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贯彻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正是依据这一条，把对文革提出批评意见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定为“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判处了死刑。例如，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女），只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被定为“反革命”，1969 年 9 月被捕。在狱中，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坚贞不屈。1975 年 4 月，以“反革命罪”对张志新判处死刑，临刑前害怕她呼喊口号，竟将她的喉管切断，惨绝人寰！

《公安六条》的第 4 条，将地、富、反、坏、右、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员及其家属等 21 种人，都列为专政对象，规定：“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这一条，把“专政”的范围无限扩大。至于什么是“破坏行为”，如何“严办”，均没有任何解释和政策界限，任由人们随意去理解和执行，在当时极“左”思潮极度泛滥的情况下，这就为不受任何约束地乱打、乱斗、乱杀，大开方便之门。

《公安六条》的恶果

《公安六条》发布后，全国陷入恐怖之中。这一时期，实行所谓的“群众专政”，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对无辜群众随意进行逮捕、审讯。许多人在刑讯逼供下身心遭受摧残。在农村，有些群众组织擅自设立“贫下中农法庭”，对抓来的人进行非法审判，滥杀无辜，给当地民众造成极大伤害。

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内党外要求健全法制的呼声高涨，纷纷谴责那个不成体统的《公安六条》。1979 年 2 月，由公安部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终于宣告将《公安六条》予以撤销。

《 炎黄春秋》文 / 崔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评斯大林诗

诗人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讲了一则斯大林的八卦：斯大林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说自己有个朋友写诗，想请他看看，听听他的意见。帕斯捷尔纳克收到诗稿后，一眼就看出那是斯大林自己写的。过了几天，斯大林又打来电话。帕斯捷尔纳克犹豫了一下，说：“请转告你的朋友，以后最好别再写诗了。”

“天才和不愿不挠的统帅”的诗人梦，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中。

文艺爱好者斯大林令文艺工作者们怕得要命。一次，电影导演科津采夫为斯大林放映自己导演的一部电影。其间，斯大林的助手走进放映室，开了灯，交给斯大林一张字条。斯大林嘟哝了一句：“不好。”科津采夫立即吓晕过去。斯大林鄙夷地对旁人说：“等这个可怜虫醒过来后，你们告诉他，我说‘不好’是说字条不好，不是说他的电影。整个西方都对斯大林同志说‘不好’，斯大林可没有因此而晕过去。”

1936 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首演，斯大林出席。不过，第一幕还没结束他就愤然离场。很快，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猛烈抨击此剧。转眼间，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1937 年，“大清洗”拉开序幕，肖斯塔科维奇和帕斯捷尔纳克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被捕或失踪，两人惶惶不可终日。“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说。

肖斯塔科维奇完成《第五交响曲》，将它献给斯大林。帕斯捷尔纳克在 1933 年后的十年间没写一行诗。

1948 年，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被苏共中央宣布为“左倾”和“资产阶级堕落”的表现，他被解除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的职务。他做了“改正错误”的保证，开始写“政治上正确”的作品。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人道主义色彩浓郁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1950 年，肖斯塔科维奇被授予斯大林奖金。1953 年，斯大林死后，肖斯塔科维奇立即写了《第十交响曲》，以示和之前的妥协完全划清界限。他说：“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

1958 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立即遭到当局围攻，被苏联作协开除。他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低声下气，只求不被驱逐出境。

《 能源评论》2013 年第 1 期文 / 刘青松